

1985: 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年的文化记忆

朱立元 刘阳军

(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1980年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无疑是新时期文艺学美学探索和发展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不可少的环节。它大致可分为酝酿-发生期、发展-高潮期以及深化-转向期三个阶段;它主要探讨了自然科学方法论引进的合理性、新方法运用的评价、文艺学方法论之多层次性及各层次关系、文艺学方法论与文学观念之关系、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文艺学方法论多样性关系以及文学主体性等六大问题;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宏观境域中,开放、变革的大思想文化环境、人自身的现代性启蒙、文艺及理论批评观念的解放、文学创作新潮和人文自然科学方法引入的热潮相结合等,是促成此“方法论热”众多复杂原因中的几大根由。这场“方法论热”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指导下的一个大破大立、破中有立的动态过程,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引起甚至促进了思想领域的整体革新。

关键词: 1985; 文艺学美学 “方法论热”; 文化记忆; 思想解放; 现代性转型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6) 01-0120-17

1980年代是保守与激进、怀旧与革新、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等诸种复杂的思想文化观念和思潮相激荡、碰撞与融合的年代,因而也是转折与变革、扩张与批判、危机与新生相交织并存的年代。在此背景下,文艺学美学领域的“方法论热”勃然兴起,并达至高潮,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翻开了新时期文艺学美学探索、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我们认为,此“方法论热”一方面是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整体变革、转型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那一代学人艰辛求索、不断创新的突出体现;另一方面,它不仅深层地形塑着新时期文艺学美学的文化生态,且在相当程度上孕育、规约着其后文艺学美学发展的可能态势及走向;更关键的是,它深刻地激荡、解放、改变、拓展着拨乱反正后那一代学人的心灵、身份认同以及精神、观念、思维、视野等。这一切,对于1990年代以后直至今天的文艺学美学的探索、创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在“文革”刚刚结束、政治上拨乱反正后的一代学人中,相当一部分亲历、参与了此方法论热潮。本人就是其中一员,较早关注并积极倡导文艺学美学的“现代化”、“多元化”、“开放化”及研究方法的更新,深度参与了这场大讨论。^①缘于此,本文尝试从一个亲历者、参与者及见证者的文化记忆入手,在更广泛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意义上,也即主要站在学术史的高度来回望、还原、剖析1980年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在学界生成、发展、起落的历史场景及文化生态等种种复杂状况,并反思和检省其理论探索的曲折路径和经验教训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文化记忆绝不仅仅局限于若干个人或者少数人,实际上也反映、代表甚至就是当年一大批学者共有的集体文化记忆。诚如扬·阿斯曼所言,个人文化记忆需要凭靠“集体成员的集会和集体成员本人的在场”^②

作者简介: 朱立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美学;刘阳军,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专业方向:文艺学。

^① 本文中凡“本人”均指朱立元,参与讨论的成果有朱立元《力促文艺学的现代化》(《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第1期)、《美学研究的方法应当多元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开放:内在机制的需求》(《文艺争鸣》1986年第4期)以及合作主编并参与撰写了《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等。

^②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2页。

来获取,这一判定深刻地揭示出,个人文化记忆也是一种特殊的集体记忆。

我们注意到,对此“方法论热”的研究,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之后,均取得了不俗实绩。譬如段文耀《文艺学方法论与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张健《关于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综述》等早期成果,特别是21世纪以来季水河《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方法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夏中义《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年》等晚近成果更是富有启发性。^①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社会文化整体加快现代转型以及人们的生存、生活方式发生巨变的新时代,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探索创新的当下学术语境中,我们重构此“方法论热”的文化记忆的尝试,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或可为当前文艺学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某种启示和参照。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题目中标明“1985”年,并不是说1980年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只是发生在1985年,而是想要说明那一年是“方法论热”的“大年”、高峰年和承上启下的一年,事实上,当时就有学者将1985年称为“方法论年”,而将1986年命名为“观念年”,说明文学观念的重要变化是由方法论热潮引发和带动起来的。^②

一、1980年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的三个阶段

下面,我们将以1985年为中心,往前追溯、向后推移,梳理一下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的发生、发展轨迹和进程,依照时间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酝酿-发生期: 1970年代末至1983年^③

1970年代末期,“文革”宣告结束,而与此同时,一场蛰伏、酝酿已久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社会经济、政治及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随即兴起,迅速蔓延、展开,形成极为广泛而又威力无比的变革创新的时代潮流,纵贯整个1980年代。

一方面,在此大背景下,1979年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和周扬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代表党中央提出文艺的“二为”方向(没有再提“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重倡文艺和理论批评的“双百”方针,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极“左”文艺路线和方针逐渐遭到摒弃和批判,文艺观念拨乱反正出现新局面。毛泽东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信件和“共同美”问题谈话的发表,引发了文艺理论界、美学界的热烈讨论。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该文作者为李子云)和李泽厚《形象思维再续谈》(《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二文,前者明确提出文学应当回归自身,而不应当只是充当政治的工具,实际上是呼唤恢复文学之为文学的审美特质,这在“文革”刚结束、极“左”文艺观念仍占主流的文艺界和文艺理论界,产生了石破天惊的冲击和引领效果;后者则通

^① 段文耀《文艺学方法论与中国文艺学的发展》,《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张健《关于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综述》,载《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上,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季水河《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方法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夏中义《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年》,《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3期。此外还有如周来祥《美学研究的现状及前景》(《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以及高建平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等文艺学批评史、学术史、思潮史均有相关探讨。

^② 关于“方法论年”、“观念年”之命名的几种说法:(1)据钱竞《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之记载,1985年是“方法论年”,1986年、1987年“很可能”是“观念年”。(2)据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之记载,当时文艺理论界流行着1985年是“方法论年”以及1986年是“观念年”之说法。(3)据杜书瀛《理论的脚步》(《文艺争鸣》2013年第5期)以及夏中义《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年》(《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3期)之记载,1985年为“方法论年”。综合来看,(1)1985年是“方法论年”这一说法后来便逐渐落定为文艺理论界集体的文化记忆;(2)1985年为“方法论年”以及1986年为“观念年”不仅更符合当时文艺学美学探索和发展实际状况,而且在当时学界确实已成为流行看法。

^③ 参见陆海明《我国文艺学方法论研究的现状和趋势》,《社会科学》1986年第12期。

过强调文艺的形象思维特点，实际上告别了长期以来统治文艺学美学的机械“反映论”的整体框架。^①这对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变革起到了铺垫作用。1982年春，青年学者夏中义在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年会（广州会议）上作了题为《评〈文学的基本原理〉的方法论》的大会发言，批评了叶以群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以“反映论”的整体框架遮蔽了文学的情感、想象的审美特性等^②。这也许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早明确上升到方法论层面来论述文学审美本质的成果。应该指出，上述这些理论探讨得到了文艺创作实践的强烈支持，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思潮一波接一波涌出，与多种形态汇集的“现实主义文学热”彼此交错、交融，形成了初步繁荣的文学新气象，同时，也向文艺理论和美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和思考重点。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热”与“人道主义讨论”是1980年代初学术界思想解放运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降，随着思想解放运动逐渐展开，对“文革”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的反思逐渐深入，尊重人和人的价值的人道主义思想成为普遍共识，文艺创作中长期被视为禁区的描写超越阶级性的“共同人性”及表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不断涌现，“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也被重新提出^③，并得到文艺界和理论界的普遍重视和认同，进而与当时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界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热烈讨论融合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下半年起到1982年底，学界发表关于人、人性、人权、人情、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论文近500篇，其中文学、美学方面的文章过半。这场人道主义大讨论是在学界认真学习、研讨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热潮中被激发起来的，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重新认识直接相联、密切结合。1983年，时任中央宣传部主要领导人的周扬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一文，将这次讨论推向高潮，但同时也是人道主义再度面临批判、压抑的转折点。仅仅10个月之后，胡乔木发表长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④对周扬等人进行直接批判，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将这场人道主义大讨论硬生生地压了下去。所幸这场批判时间较短，草草收场，文艺学美学界思想解放的理论热情并没有被完全浇灭，而是继续在其他方面，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方法论的探讨也许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1985年底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提出及讨论的展开，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道主义和“文学是人学”思想的延续和深化。

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和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发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⑤的号召，逐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⑥，到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⑦的重要论断。在这样一种全民崇尚科学、学习科学的氛围下，学界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研讨也随之热了起来。1980年《哲学研究》发表评论员文章《积极开展科学方法论的研究》，1981年《哲学研究》编辑部出版了《科学方法论文集》，号召“从事哲学、逻辑学、科学史、心理学、语言学等方面工作的同志都来关心科学方法论”，“积极开展方法论的研究”。^⑧一时间，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译介和引进成果^⑨的基础上，西方科学方法论、

① 夏中义《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年》，《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3期。

② 夏中义《文学是非纯认识性的精神活动》，《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③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此文写于1957年10月26日，实是为其遭到长期批判的《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一文申辩的。

④ 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理论月刊》1984年第2期。

⑤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全国科学大会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4页。

⑥ 郭沫若《科学的春天》，载《全国科学大会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1页。

⑦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事实上，早在“文革”后期，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胡耀邦就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

⑧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页。

⑨ 譬如“老三论”在此时已开始译介和引进。如毕德显译《介绍信息论》（《电信科学》1956年第5期）、曾肯成译《控制论的若干基本特征》（《科学通报》1955年第12期）、裘辉译《马克思和现代系统论》（《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6期）等。

哲学方法论以及西方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等方面^①的译介和引进在学界掀起了一股热潮。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至1985年被确定为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和方向,也从一定程度上、一个侧面呼应了这一历史趋向和诉求,并进一步明确,甚至定格了包含人文科学在内的学科教育和研究之开放、包容的走向。^②据本人记忆,在“科学技术现代化”讨论大潮中,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竭力想把人文社会科学也纳入“科学技术生产力”的范围,以争取学术发展的一定话语权。而这可能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文艺学美学大力引进和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原因。当然,也不排除有学者所推测的那样,一些学者采取“围魏救赵”的曲线方式,通过提倡、尝试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论于文艺学美学研究,以摆脱机械反映论的束缚,深入文艺的审美本质研究。^③

以上两大方面诸种因素相互缠绕、交织,整体上共同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营造了比较开放、包容的话语环境,提供了人学意识、文学观念以及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思想准备。与此同时,关于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更新的讨论和运用已经初露端倪。值得重视的是,以“研究当代文艺思潮,追踪文艺发展趋势,开拓文艺研究领域,革新文艺研究方法”为宗旨的《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4月在兰州创刊,其不仅在创刊号中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文艺学美学欲现代化,关键在打破与其他兄弟学科间的界限而达成多角度、多学科、多层次的自我整体审视、综合和建构之时代脉动和历史趋向^④,而且仅创刊至1983年就相继开辟了“文艺学与社会科学”、“美学与文艺学的现代化问题”等栏目,之后又开辟了“文艺学与现代科学”,“文艺学、美学与其他学科”及“文艺学与自然科学”等栏目,思考和探索文艺学美学方法的跨领域、跨学科革新。就此而论,作为“中国文艺运动的需要”^⑤之《当代文艺思潮》之创刊,无疑标示了之前分散、零星的探讨逐渐向相对集中的、形成一定规模的方法论讨论方向转移和推进。^⑥

这一时期文艺学美学研究开始借鉴、运用自然科学的主要方法有数学方法、系统科学方法等。较早涉及数学方法的如徐中玉《苏轼创作思想中的数学观念》(《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等;较早涉及信息论方法(物理学)的,有高尔太(又名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等,高尔太运用“熵定律”论证了“多样归一”的美学规律;稍后,张世君《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悲剧系统》(《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4期)、曾永成《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等开始尝试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

2. 发展-高潮期: 1984年至1985年^⑦

1984年至1985年,在酝酿-发生期基础上,在文艺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进一步调整与重构,以及文学“寻根”等问题探讨逐渐深化的语境下,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变革的吁求进一步升温。

① 譬如《国外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提要》、《当代文艺思潮》、《国外文学》、《读书》等期刊译介和引进了如统计学、生态学、模糊数学、测不准原理等科学方法论以及国外哲学方法论、文论方法论等。还有《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蓝仁哲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等译著。

② 王永斌《知识镜像与中国经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7-30页。

③ 夏中义《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年》,《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3期。

④ 朱立元《力促文艺学的现代化》,《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第1期。

⑤ 谢冕《中国文艺运动的需要——评〈当代文艺思潮〉》,《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6期。

⑥ 季水河先生在《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方法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中认为,张世君《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悲剧系统》和曾永成《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美学研究方法变革的序幕”。我们认为此说不符合实际。据查,张文刊载于《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4期,据《外国文学研究》之官网所言,其时为季刊,出版时间为1982年12月;曾文刊载于《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据川师新闻网《务实·求真·奋进——〈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40周年纪实》一文所言,其时为季刊,出版时间为1982年12月。仅仅单就较之于创刊于1982年4月,且以“革新文艺研究方法”为宗旨之一的《当代文艺思潮》杂志而言,不论从时间,还是从数量规模、重要性、影响力上看,此说都很难站住脚。

⑦ 参见刘再复《近年来我国文学评论界的三次变革热潮》,《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7年第1期。

尤其是,1984年12月29日召开的以胡启立《祝词》^①及其倡导的“创作自由”、“评论自由”精神为标志的中国作协“四大”之后,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研讨达至高潮。^②此一时期文艺学美学方法论讨论的核心问题:一是以“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论”如何应用于文艺学美学研究以及二者相结合的问题;二是在“文学主体性”理论酝酿过程中大力引进、借鉴西方现代美学、文论的研究方法。

首先,在前一时期自然科学方法论受到较普遍重视、应用之基础上,“老三论”、“新三论”先后集中引进,并被广泛接受、应用于文艺学美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林兴宅和黄海澄。前者的《论阿Q性格系统》(《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论文学艺术的魅力》(《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两篇文章,以系统论方法研究阿Q丰富复杂的性格系统,及文艺在接受者身上产生魅力的功能系统,其方法论的变革和独创,引起学界普遍关注、重视,尽管也遭到某些诟病。后者的《从控制论观点看美的客观性》(《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1期)和《从控制论观点看美的功利性》(《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3期),则运用控制论方法有效地检视了美的客观性、功利性问题,同样引起学界的广泛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1986)一书,成为国内第一部用自然科学方法论书写的美学原理性著作。其他如姜庆国《信息论美学初探》(《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1期)、朱丰顺《运用系统论研究文艺》(《文艺研究》1985年第3期)等一批文章也陆续发表。随后,“新三论”被较为集中地引进,使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又添新彩。如耗散结构论的“负熵”、协同论的“平衡态”、突变论的“随机性”以及“悖论”、“组合论”、工程论、传播论等^③其他自然科学方法论,纷纷涌入文艺学美学领域,发表了如丁宁的《耗散结构和艺术创新》(《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6期)、《论审美趣味自组织的协同性》(《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2期)与德万《突变理论与人物塑造》(《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2期)等^④一大批文章。同时,相关著作也迅速推出,成绩斐然,如陶同《当代科学与美学的变革》(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林兴宅《艺术魅力的探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此外,尝试运用如模糊数学等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文艺,也取得了不俗业绩,如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与明确性》(《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李欣复《模糊文艺学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85年第6期)等。

其次,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引进也紧步其后。许多“外国文学批评流派、社会科学学派”的理论观念、方法进一步译介和引进。^⑤1984年至1985年,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文艺思潮,尤其是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大量涌入^⑥,甚至后现代主义文论也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译介和引进。^⑦在译文方面,如《美学译文》、《美学与艺术评论》、《世界艺术与美学》等刊物译介了众多西方美学资料;^⑧在译著方面,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选的《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集中译介了国外现代主义文艺学美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的《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则译介了西方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新近进展;还有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王春元、钱中文主编的“现代外国文

① 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上海文学》1985年第2期。

② 王蒙《读评论文章偶记》(《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和潘凯雄《1985年文艺理论批评综述》(《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3期)均认为,此后(即1985年)文艺评论及理论批评达到“空前活跃与繁荣”。

③ 傅修延、夏汉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2页。

④ 此外,在1984年至1985年间,《当代文艺思潮》、《音乐艺术》等期刊发表了与运用悖论论、工程论、范式论、增熵论诸科学方法论相关的大量文艺学美学文章。

⑤ 陆海明《我国文艺学方法论研究的现状和趋势》,《社会科学》1986年第12期。

⑥ 高建平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25页。

⑦ 朱立元《后现代主义文论是如何进入中国 and 发生影响的》,《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⑧ 蒋孔阳《序》,载蒋孔阳、朱立元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页。

艺理论译丛”等^①也陆续引进了众多文艺学美学方法论。这一大批论著的译介,对于学界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同时,积极借鉴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产生了巨大作用。譬如,在文艺学运用心理学方面,论文和著作都很多,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是“文革”结束后的首创,滕守尧的《审美心理描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等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里着重介绍一下伴随着文艺学方法论变革而逐步酝酿成熟的“文学主体论”的提出过程。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提出,既是综合运用多种新的研究方法的结果,也是将“方法论年”推向高潮的重要标志。但是,它的提出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如前所言,它是1980年代初人道主义和“文学是人学”讨论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但我们认为,其更直接的启示来自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李泽厚“主体性”概念之提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体现在《康德哲学与建设主体性论纲》(1981)、《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1983)、《关于主体性的第三个提纲》(1985)等多篇文章中,从主张主体性是人类主体性到个体主体性,再到主张主体性的“双重结构”,即外在的工艺—社会结构面和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面,以及人类群体性质和个体身心的性质。^②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论是李泽厚“主体性”思想在文学研究中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刘再复后来说,文学创作强调主体性,包括两层基本内涵:一是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位置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和主人,也即把人看作目的,而非手段。二是作家应该意识到文学的命运与人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因此,“文学是人学”的不朽命题由此产生,这个命题在文学领域中恢复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地位,进而向人的“内宇宙”延展,承认文学是人的灵魂学、性格学及精神学。^③由此可以看出,此说不仅在文学观念上有重大突破,而且具有方法论创新的重要意义。

再次,这一时期,文学、美学界举行了一系列关涉方法论问题的学术会议,为方法论更新鸣锣开道。除1984年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兰州会议、浙江省景观审美研讨会等与方法论相关的会议外,1985年文艺理论界在多地召开了以“文艺学方法论”为中心议题的全国性学术会议:3月在桂林举行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四届年会”以文论研究方法更新和多样化问题为核心;同月在厦门举行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以文艺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关系问题为主题;4月在扬州举行的“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集中讨论文艺学方法论与老、新三论的关系以及其自身的结构、层次、体系等问题;10月在武汉举行的“文艺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重点讨论文艺学方法论与系统科学方法论及与文艺观念、文艺本体的关系等问题。这些会议在学界造成了很大声势,产生了重要影响,把文艺学美学方法论讨论推向高潮。1985年由此而被冠以“方法论年”。

3. 深化—转向阶段: 1986年至1987年^④

1986年至1987年,学界一方面继续深化和拓展第二阶段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主题的研讨,譬如深化老、新三论的文学化、美学化以及其得失问题的讨论,并尝试继续引进新方法、新观念,开掘新视角、新领域等,^⑤出现了刘再复所谓的文学“文化热”;另一方面,随着文学、美学观念的不断解放和迅速更新,方法论的大讨论引发并逐渐转向价值论层面,兴起了所谓文学“价值论热”^⑥。在批判

^① 还有如凌继尧译《美学与系统方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石天曙、滕守尧译《走向科学的美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以及“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甘阳主编、“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汤永宽主编)等。

^② 李泽厚《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载《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4页。

^③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上、下),《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

^④ 参见张健《关于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综述》,载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上册,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175页。

^⑤ 由于前一阶段的充分酝酿和准备,黄海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张相轮、凌继尧《科技之光——科技美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杨春时《系统美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鲍昌主编《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等相关文艺学美学著述、词典纷纷问世。

^⑥ 刘再复《近年来我国文学评论界的三次变革热潮》,《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7年第1期。

和突破机械反映论和激进“外部论”(如政治、社会、历史等对文学强制介入)等基础上,文学“价值论热”围绕主体精神价值论这一核心议题而展开热烈讨论,并逐渐深化、扩展为文学的“本体论热”^①,文学之存在与人之存在的本体论关系等逐渐成为文艺学思考的核心议题。

在这里,我们重点提一下“文学主体性”讨论热潮。^②1985年前后,刘再复相继发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读书》1985年第2、3期连载)等^③与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以及与主体性观念密切相关的重要文章,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观念以及思考方向等得到了学界众多学者的积极肯定和阐发。尤其是《论文学的主体性》的发表,引起学界强烈反响,《文汇报》、《文学评论》等报纸、期刊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和讨论。而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红旗》1986年第8期)一文从政治、哲学和学术等多个层面对刘再复以“文学主体论”为主的系列观点展开了尖锐批评,则标志着这场讨论的中心开始由文学方法论向文学观念转化。这场争论一定程度上带动和助推了文学“价值论热”和“本体论热”,甚至对“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寻根”等文学“文化热”思潮也有所促进,同时,也标志着文艺理论界关注热点的转移,即由“方法论热”向“观念热”转化。

至此,我们大致回顾了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演进的三个主要阶段,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方法论热”仅仅止步于此,或者说到此完全结束了,而只是说这三个阶段凸显和代表了此“方法论热”之发生、发展的主要轨迹和脉络。

二、1980年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所讨论的主要问题

综观1980年代文艺学美学的“方法论热”,可以发现其呈现出两种明显的流向:一为科学流向,以引入和运用新、老三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为主;一为人文流向,以引入和运用心理学、情感现象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为主。^④而从这股方法论变革热潮所关注的重点来看,它主要围绕如下六大问题展开讨论:

1. 关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以老、新三论为核心)的借鉴和引进有无必要性、合理性的讨论

对此问题,大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虽然与自然科学不同,但作为人文科学,应当借鉴和引进自然科学方法论来变革、丰富和发展自身。在这一观点内部,对如何借鉴和引进问题还存在态度上的程度差异问题:第一种持宽容、开放、自信和积极尝试、应用的态度,如钱中文、林兴宅、钱学森等;^⑤第二种持审慎、观望乃至警惕的态度,但不完全否定,如在扬州“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会议上徐贲、夏中义等就持此观点。而另一种持反对态度,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分属不同领域,即价值领域(包括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和认识领域,性质迥异,它们各自的问题只能靠它们在各自学科领域中解决,因而反对文艺学美学研究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反对把这两个不同领域搅和在一起,如刘小枫、杨柄等。^⑥现在看来,关于上述问题,最为可取的态度和做法,应当是采取开放的视野,坚持以文学、美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地、有选择有批判地借鉴、改造和吸收某些与文学、美学研究对象相关联、相契合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加以创造性的应用,以扩大其阐释范围,增强其阐释力度。当然,那种无条件的开放、无选择的引入,不问新方法

① 王岳川《文艺方法论与本体论研究在中国》,《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② 钱仲联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111-1113页。

③ 还有《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1985年7月8日、《文学的反思和自我的超越》(《文艺报》1985年8月31日、《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等。

④ 参见朱立元《对文艺学方法论更新的若干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⑤ 钱中文《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更新方法的迫切性》(《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林兴宅《科技革命的启示》(《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等。

⑥ 转引自钱竞《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李心峰《武汉文艺学研究方法论讨论会综述》,《文艺争鸣》1986年第2期。

是否适合于文艺、审美对象，为方法而方法的强制更新的态度；或者那种对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方法，不问是否适合于研究文艺、审美对象，而一概采取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完全拒斥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都应当防止和克服。

2. 关于文艺学美学尝试运用新方法论的得失以及如何给予客观、全面评价的讨论

多数学者紧密联系学界方法论变革的实践，认为文艺学美学新方法论的探索和尝试有利于整体地、纵深地、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丰富复杂的文艺和审美现象，有利于文学、美学研究思维、心理空间的拓展以及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的多样化，也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体系，如李准、董学文、南帆等^①。而部分学者认为，应当警惕和防止对新方法的“生吞活剥”、“生搬硬套”以及“轻视哲学思维”等，因为这非但不能解决文学实际问题，而且会造成本末倒置、为方法而方法之乱象，如孙文宪、杨曾宪、孙绍振等^②。这两种观点，看似绝然对立，实际在根本上有一致之处，因为后者并不是全盘否定文艺学美学引进新方法，而是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某些为方法而方法的不良倾向，强调应用新方法不能“生吞活剥”、“生搬硬套”，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批评的那种“强制阐释”。我们认为，从历史和发展的观点看，在新方法引进和运用中尽管出现了诸多问题和弊端，但这是文艺学方法论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股新方法论思潮的二律背反、复杂运动中的更新和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局部（而不是全局性）问题，并不是主流；从积极方面考量，更应当看到，“方法论热”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方法论，所以，总体上应该予以肯定。总之，关于新方法运用之得失问题，应当以整体的、全面的、开放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加以客观而辩证的审视，既看到问题和不足的一面，更要看到积极、前进的一面。

关于文艺学美学研究新方法如何引进、变革的问题，钱中文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也最富前瞻性。他认为应当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应当以文艺本身的特征为前提和基础；二是引进和运用新方法的目的是扩大文艺研究领域以及重新阐释文艺现象；三是在引进和运用新方法时应当正确、恰当地处理行之有效的老方法，不能把方法的错误运用与方法本身相混同。^③钱先生这个观点在“方法论热”如火如荼展开的1986年初就能提出，确实是全面、辩证、颇有见地的；特别是第一点，强调引进、运用新方法必须契合所研究的文艺对象的审美特征，并以此为前提和基础，的确抓住了方法论变革的“牛鼻子”，至今仍然是合理引进、运用好新方法的关键所在。

3. 关于文艺学方法论的多层次性及各个层次关系的讨论

大多数学者认为，文艺研究方法论具有多层次性，可以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以及具体学科方法三个层次，但他们对各个层次的理解不尽相同，如周宪、周来祥、姚文放等。^④部分学者则对如何分层次有不同看法，陆贵山认为文艺研究方法论应当分为哲学方法论、“三大论”（老三论）方法论（“中间环节”）、文艺学方法论以及文艺学内部具体方法论四个层次；^⑤钱中文认为文艺学方法论体系应当分为哲学方法，文学的各种特征所形成的方法或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借用与文学各种特征相适应的、不同学科的方法，比较文学、典型研究等方法以及各种具体的方法和手段（如数学统计、语言、传记）四个层次^⑥；朱丰顺认为科学的方法论应当分为哲学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和

^① 李准、丁振海《马克思主义和文艺理论新方法的探索》，载陆梅林、盛同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上册，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董学文《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南帆《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② 孙文宪《对更新文艺研究方法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杨曾宪《艺术民族化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试探》，《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1期；杨曾宪《论审美是系统存在》，《浙江学刊》1986年第4期。

^③ 钱中文《文艺学观念和方法论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第1期。

^④ 周宪《关于文学研究方法几个问题的思考》，《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6期；周来祥、姚文放《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和辩证思维》，《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

^⑤ 陆贵山《论文艺学方法论的层次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文艺争鸣》1986年第1期。

^⑥ 钱中文《主导、多样、综合：一种趋势——文学研究方法漫议》，《文艺报》1986年3月8日理论版。

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仅适用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一方的方法”、“仅适用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较小范围的方法”以及“仅适用于一门自然科学或一门社会科学的特殊方法”五个层次等。^①以上观点虽各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共性:一是都把哲学方法置于方法论系统中的最高层次;二是都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归属为最高层次的哲学方法,说明当时整个方法论变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三是都把自然科学方法论纳入各自的方法论分层系统,说明经过“方法论热”的洗礼,文艺学美学有条件地借鉴、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已被大部分学者接受,成为一种共识,这应当是方法论变革的重要成果之一。

关于文艺学方法论各个层次关系的讨论,多数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最高指导原则和原理,它指导但不能代替具体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体系既是历史的、美学的理论体系,也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上既不能因哲学方法重要而取代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也不能因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的具体化、多样性而取消哲学方法的指导作用和意义,事实上各层次关系是极其复杂的,既相互交叉,又相互区别,如陆贵山、周宪等^②。将以上这些看法加以归总,学界当时达成的共识是,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系统应当包含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及具体学科方法三个主要层次,各层次之间既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又相互区别和独立;作为具体学科方法层次的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本身可以是多样化的,但应该符合、契合于文艺和审美现象的特征。这个共识将人们对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更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4. 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文艺学方法论多样性关系的讨论

讨论中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研究老方法(社会历史批评方法、道德批评方法等),已经“失去效用”、“过时”;第二种观点认为新方法(如系统论等)已经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之中,并不是独立的新方法,此即为所谓“包括论”,如李冬木、李志宏等;^③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开放的、不断创新的,不仅应当提倡文艺方法论的多样化、多元化,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如周来祥、钱中文等。^④多数学者认为,综合和吸纳古今中西方法论的有益成果,为文学批评、研究所用,是文艺学方法论多样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艺学方法论多样性理应包含新老方法关系这一重要内容。关于这一点,多数学者认为新方法的倡导和运用不应当以排斥和摒弃原有的传统方法为代价,传统方法的继承和挖掘有助于新方法的运用,新方法是对传统方法的补充和发展,二者应当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如王愚、孙绍振等;^⑤而另一些学者则对传统方法持批评态度,极力主张文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以林兴宅为代表。^⑥上述讨论实际上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第一,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是极为丰富复杂、开放的综合系统,既有内在方面,又与外部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单一的方法都不足以穷尽对它多层次、多方面、动态结构的理解和阐释,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并不意味着传统方法完全失效、过时,比如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方法就兼顾了内外两个方面,是文艺学美学研究依然应该遵循的基本方法,绝没有过时。第二,当然,对于传统方法的运用,也需要有所反思、有所总结,不应该盲目

① 转引自李心峰《深入探讨方法论 努力发展文艺学》,《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

② 陆贵山《论文艺学方法论的层次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文艺争鸣》1986年第1期;周宪《关于文学研究方法几个问题的思考》,《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6期。

③ 李冬木《现代文学研究与系统科学方法移植》,《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3期;钱竞《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④ 周来祥《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和美学、文艺学的方法论》,《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钱中文《主导、多样、综合:一种趋势》,《文艺报》1986年3月8日;朱立元《美学研究的方法应当多元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⑤ 王愚《在多样化的面前》,《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晓丹、赵仲《文学批评:在新的挑战面前》,《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⑥ 林兴宅《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研究中的运用》,《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林兴宅《文明的极地——诗与数学的统一》,《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肯定、全盘沿用,比如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本身在对文艺、审美现象的外部研究上是适合的,不可轻易抛弃,但是,过去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在运用中存在着严重的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实际上也偏离了真正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精髓,所以,运用传统方法要具体分析,不要一概而论。第三,文艺学研究作为体现作家感性生命和审美理想的复杂文学活动,是不是必须遵循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化的方法?文学研究要不要追求科学性?如果要,这种人文研究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是否一样,它们的异同何在?这个问题当时虽然提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展开充分讨论,更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所以,直到21世纪,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依然在进行^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1980年代的“方法论热”既包含着某些局限和未解决的难题,同时也包含着潜在的活力,给我们提供了继续研讨、与时俱进、不断深入的理论场域。

5. 关于文艺学方法论与文学观念之关系的讨论,包括文艺本质观念的论争

关于这一讨论,多数学者认为,文艺学方法与文艺观念(包括艺术和审美的思维方式)是紧密联系的,文艺观念的更新为文艺学、美学方法的变革提供基础性、必要性的依据,而文艺学方法的更新和变革又反过来体现、预示甚至促进文艺观念的创新和丰富化、深刻化,如钱中文、林兴宅、徐贲等^②。钱中文论及文学本质、“本性”问题时指出,它应当是多层次的,第一本质层次为哲学层次,即把文学现象置于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层面进行阐述,第二本质层次体现在心理、社会、历史、语言、本体等层次,第三本质层次由引进和运用其他方法所获得,如此等等,由此文艺学方法论与文学本质或“本性”观念便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互动的、综合的系统结构。总体说来,文艺观念的更新与文艺学方法论的变革二者的关系是丰富而复杂的,它们必然且应当是相辅相成、互动互融的。一般说来,方法(及其变革)从属于观念(及其变革),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方法的变革也会推动、促进观念的变化和更新,两者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主从关系,而是辩证的、互相促进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1985年“方法论年”催生了1986年的“观念年”,便是有力的证明。

6. 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论争^③,是在方法论变革、更新过程中发生的关于文学本质观念的论争

这场论争鲜明地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以刘再复为代表,一派以陈涌为代表。刘再复受李泽厚“主体性”思想启发提出“文学主体论”,认为人的主体性包括“精神主体”和“实践主体”,人具有“能动性”和“受动性”二重性,文学在注重实践主体之目的性的同时更应高度重视精神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文学主体性应当包括侧重“精神主体”意义层面的“创造主体”、“对象主体”以及“接受主体”等。^④这些新概念、新观念对学界长期存在、占主流地位的“独断论”、“机械决定论”等旧观念无疑形成了有力的冲击和突破。陈涌等从方法论角度切入,针锋相对地批评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忽视文艺的社会历史前提和基础,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这一哲学基础,它忽视了人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实践主体”,人的受动性和能动性都是由社会实践中的人来体现和实现的;^⑤敏泽认为主体即“客体的主体”,文学创作就是“主体的客体化”过程^⑥;程代熙也认为认识自身和世界只能通过“实践主体”,所谓精神主体的力量源泉在人的“实践活动”,如此等等。^⑦杨春时等则在综合、发挥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基础上,批评陈涌片面理解

^① 如王元骧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发起了以“文艺本体论新论”为题的一组笔谈,深入讨论了这一问题。

^② 钱中文《文艺学观念和方法论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第1期;林兴宅《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文艺观念的变革》,《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徐贲《哲学和文学研究方法论》,《文艺研究》1985年第4期。

^③ 参见红旗杂志编辑部文艺组编《文学主体性论争集》(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年)、何火任编《当前文学主体性问题论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等。

^④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⑤ 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红旗》1986年第8期。

^⑥ 敏泽《论〈论文学的主体性〉》,《文论报》1986年6月21日。

^⑦ 程代熙《对一种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述评》,《文艺报》1986年7月19日。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等观点,认为文艺主体性和超越性之哲学基础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而是认识论与价值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实践哲学”,强调“充分的主体性和超越性”是文艺的自由品格和本质特征;^① 郝亦民也从“主体意识”方面论析和补充了刘再复“文学主体论”^②。此外,对刘再复提出的与“文学主体论”紧密相关的“性格二重组合论”,本人从典型的复杂性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给予了批评和补正。^③ 实际上,对于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从其提出至今,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是,我们认为,经过30年的理论反思和沉淀,客观地说,其基本精神是正面的,在研究方法和观念上具有革新指向,对于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政治路线支配下形成的忽视、甚至压制文学主体性的理论主张和观念具有冲击、纠偏的积极意义,不应该全盘否定,而应该在总体上予以肯定。当然,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在理论上还存在一些疏漏和偏颇,需要批评和补正。这场讨论的一个有益启示是,“文学主体论”的提出当然是文学观念的更新,但是,细究起来,这与刘再复重视、倡导、参与文艺学方法论的变革直接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的研究方法(如系统论、接受美学等方法)助推了其主体论新观念的诞生。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的“方法论热”延伸到1990年代以降,作为既关涉文学、美学内部之诸多变革问题,亦关涉到与社会、政治、文化等复杂关系问题,其所隐含的文艺学、美学的一些关键性、基础性问题,逐渐得到发掘、揭示和展开,譬如反“反映论”话语议题,“‘科学’话语”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话语议题之重启和再发掘等,都与方法论密切相关。^④

我们注意到,1980年代“方法论热”所讨论和开启的上述基本议题或问题域,固然具有特定的时代性和语境性,但诚如夏中义所言,“‘1985’方法论年蕴结着百年文论思维所以会发生转型的思想史密码”^⑤。我们认为,这一论断十分精辟、深刻。由此看来,此“方法论热”又是超越时代、面向未来的。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意义上指引、规约着当代文艺学美学问题域及创构探索的路径和趋向,其影响至今仍然没有过时。

三、1980年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兴起的复杂语境

关于1980年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变革的热潮,在本人的记忆中,一是既非官方组织或者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也没有哪一个明确的有影响的领头的学者振臂一呼,大家随后跟进、一哄而上,而是自发地发生并形成热潮;二是来势凶猛,规模壮阔,在短短一两年内达至高潮,成为一段时间内学界最中心、最热门的话题。这是学术史、思想史上的一大奇观,无论中外,都没有发生过。对此,我们的基本判断是:第一,它是观念与方法论变革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的过程;第二,方法论变革本质上是思维方式的突破和拓展,是促进观念变革的强大催化剂,由此学界才会不约而同选择方法论的革新作为突破口,进而导向观念层面的突破和创新。

在这里,我们的问题是,这场热闹纷繁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以及随后出现的具体观念的变革,其兴起及不断发展的动力、根基何在?我们认为,就其本身而言,如有的学者所言,存在着“内在需求和外在刺激”这两大因素,它们互相交织,成为推动文学理论方法变革的基本动因。^⑥ 在

① 杨春时 《论文艺的充分主体性和超越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

② 郝亦民 《创造主体与主体意识》,《文艺争鸣》1986年第3期。

③ 朱立元 《论典型的复杂性和审美价值》,《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

④ 李建立 《1980年代“方法论热”中的“科学”话语重探》,《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谭好哲、韩书堂 《1985年前后美学研究方法论热的学术史反思》,《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5期;季水河 《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方法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⑤ 夏中义 《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年》,《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3期。

⑥ 参见方克强 《我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方法论的流变》,《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

内在需求方面,文艺学美学在中国都是20世纪前半期现代性进程和借鉴国外文论、美学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新学科,基础相对薄弱。1949年以后,一方面因片面接受苏联文论、美学及其影响,而几乎完全排斥、拒绝借鉴西方文论、美学,另一方面又长期受到极“左”思想文化路线的束缚、压抑,从而造成学科理论较为贫乏,且存在机械主义、简单化等弊病,据此,文艺学、美学客观上存在着自我改造、丰富发展和创新建构的内在迫切诉求。而外在刺激方面,近代以降在外来现代性文化艺术思潮刺激下,中国文论、美学的历史实践和发展进程激发出了复杂的现代化诉求。^①下面,我们围绕内外两个动因,着重把这一“方法论热”置于1970年代末酝酿并逐渐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中,^②来探讨其何以发生和发展的主要条件和因由。

首先是开放、变革、批判的思想文化潮流、趋向构成的外部社会环境。^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大气候下,哲学、文学等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思想解放潮流也随之“喷涌”而出。一方面,思想文化界逐渐掀起对“文革”时期极“左”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恶果的彻底清理、深入反思热潮,相当程度上为恢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路线、方针、政策扫除了障碍,营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宽松的学术语境。另一方面,思想文化界的“新启蒙运动”同时应运而兴,涉及社会—经济、思想—理论、政策—制度、政治—文化实践诸层面,且渗透于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在内的众多意识形态领域的革新、开拓和开放之中,^④汇聚成势不可当的思想启蒙大潮。反思批判和启蒙建构两股思潮的激荡交汇,相当程度上既冲击了“文革”那种封闭而僵化、独断而机械的思想文化旧秩序,同时也启迪与形塑了开放、包容、变革的新的学术生态。它们作为蔚为壮观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两重历史面相,与其他诸面相和各种社会文化条件,历史而现实地契合在一起,总体上为文艺学美学的学科更新营造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有利于学术思想活跃、开放和自由争鸣的精神氛围。一句话,经济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全方位的急剧变革,从外部促进着文学观念的开拓、变革,^⑤当时就有学者大声疾呼“文艺也应该‘开放,搞活’”^⑥。

其次,从内在方面看,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新启蒙”就是人自身的现代性启蒙或“人的觉醒”^⑦它本质上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突出内容。这一历史诉求,是在人民群众饱受“文革”苦难、经历了自身的人性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丰富性、复杂性遭到扭曲、肢解、畸形化的痛苦实践的基础上,被现实地揭示和召唤出来的。由此“新启蒙”便需要历史地承担双重任务:一是是否弃和反思“文革”对人和人性的歪曲和戕害;二是返回人自身,重新而全面地认识、发现和想象人自身,追求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

据此,文艺学美学界的“新启蒙”一方面是积极批判和纠正“文革”对人性的“歪曲”和“异化”,消除其消极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文革”时期所谓“革命乌托邦”、“道德乌托邦”、“阶级乌托邦”等文艺学美学“左”的“激进”话语,^⑧如“高、大、全”、“三突出”等,展开彻底清理和批判。另一方面“新启蒙”的重心更是建设性的,即重新而全面地认识、发现和想象人自身。新时期初期,经过批判与建设的双重“启蒙”,冲破了“文革”时期“人性”的话语禁区,单一、机械、静态的“人学”观念逐渐转向丰富、复杂、动态化,思维和想象人自身的形式也逐渐

① 参见朱立元《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熊元义《当代文论建设与文艺批评发展——文艺理论家朱立元访谈》,《文艺报》2014年8月1日。

② 李公明、徐友渔《八十年代思想对话录》,载《新周刊》编《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27页。

③ 参见朱立元《开放:内在机制的需求》,《文艺争鸣》1986年第4期。

④ 李准、刘再复等《文学如何适应经济改革的新形势》,《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

⑤ 陈辽、陈骏涛《社会的变革和文学观念的变革》,《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

⑥ 陈骏涛《文艺也应该“开放,搞活”》,《朔方》1985年第1期。

⑦ 朱立元《开放:内在机制的需求》,《文艺争鸣》1986年第4期。

⑧ 刘阳军《阐释与反思:论“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文艺思想》,《重庆与世界》2014年第7期。

复杂、多样化,走向“人的现代化”。过去的老观念、老方法已经无法满足人自身的现代化研究和关于人性的自由讨论的内在需求,这一思想学术现状历史地要求大量新概念、新方法和新观念的引入。譬如,新时期人道主义大讨论就一改“文革”时期把“人性”论当作一种修正主义的“黑”论大张挞伐的话语传统,引入新观念、新方法积极探索人性及其与文艺之复杂历史关系、鲜活现实关系等问题。^①由此,我们可以判定,“文革”后“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人学”意识的重新觉醒,奠定了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的人学基础。

再次是文艺及理论批评观念的解放。1980年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学时代”^②。在“文革”时期,占据绝对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文艺观念,实质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代表的机械、庸俗、左倾化的假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根据这种观念,文艺被当作宣扬政治、革命、道德的齿轮和纯粹工具,是阶级和意识形态统治的附属品,是社会历史规律的完全机械、被动的反映和表达,如此等等。这一激进、畸形、僵化的文艺和理论批评观念,在“文革”结束后被彻底否定和抛弃,文艺和理论批评走向“现代化”的新观念逐步树立起来,人们关于文艺的认识日趋全面、深广、多样化,不再仅局限于社会、历史、政治、道德等比较单一的“外部规律”层面,而是逐渐艰难地转向和上升到更加全面、丰富、复杂的“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譬如主体性、超越性等)相结合的层面,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也逐渐转向“新美学—历史批评”^③的方法,文艺研究的审美思维得到重视和凸显。总之,这一观念的变革,是在改革开放全面推开、文化艺术“拨乱反正”、文学创作新潮起伏等诸种思想文化潮流相互碰撞、复杂交织甚至冲突的博弈中,逐渐由隐性状态转向显性状态,曲折地发生的。正是这一潜变和更替,必然而内在的导向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变革,催生了跨领域、跨学科,全面而多样化的方法论借鉴和创新,使文艺和审美活动得到了更全面的审视和更贴近的体认。由此可见,1980年代的“方法论热”是在文艺及理论批评观念的艰难潜变和新旧更替的基础上发生和展开的。

最后是文学创作的新潮、西方文论和“科学方法论”引入的热潮等条件、资源的充分准备。“文革”结束至1980年代前期,一方面文学创作新潮迭起,文艺和审美的新现象、新面貌、新状态、新问题等纷纷出现;另一方面则由于长期受机械论、工具论等教条主义观念的消极影响和深度危害,文艺学美学在理论、方法上显得薄弱、贫乏,远远落后于文艺急剧发展的新现实。在此境况下,包括文艺符号学、文艺心理学、结构主义美学、原型批评等西方人文(包括文论、美学)思潮之译介迅速兴起,形成热潮。与此同时,国外新技术浪潮,尤其是自然科学成就(如信息革命等)和“科学方法论”源源不断被引介到国内,不仅扩大、拓展了国人的视野和观念,而且其影响波及哲学、文学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一切共同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变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异域观念、方法、路径等丰富资源,在某种意义上,是“方法论热”的一场“预热”。

以上,我们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宏观境域中,对“方法论热”发生、发展的几个重要条件和因由作了重点考察和检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其他条件和因由。事实上应当且必须看到,这场“方法论热”是在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转型,工具、体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全方位、历史性变革^④进程中现实地发生和展开着。一句话,它是中国社会综合、系统变革和现代性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在这一复杂变革和转型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

^① 创作上如《班主任》、《人啊,人》等,积极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关注人的命运和灵魂,强调对人完整而复杂的世界的塑造。同时,相关理论文章更是纷纷登场。

^② 陈骏涛《一个多元化的文学时代》,《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6期。

^③ 譬如陈骏涛《批评:在通往成熟的道路上》(《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关于新的美学—历史批评》(《中国青年报》1987年8月26日)等。

^④ 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1985年7月8日“文艺百家”版。

四、1980年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的反思性总结

1980年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过去整整30年了，应当如何正确评价它，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八十年代的文化和文学思潮，深刻影响了二十年来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学研究格局”^①。我们认为，方法论变革热潮乃是最重要的思潮之一。这样说，并不出于作为亲历者、过来人个体的情绪化的怀旧，也不是“向后看”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式重建。而是基于下述思考，即在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上，以集体文化记忆视角回顾当年“方法论热”的起起落落，重建其生成、演进的历史场景，总结和反思它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寻求今天我们与之进行跨时代对话的可能性。

毋庸讳言，从这场“方法论”热潮兴起以来，人们对它的评价就存在分歧，并一直延伸至今。但综合来看，大部分学者肯定“方法论热”总体上是积极的、前进的、建设性的，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譬如少数学者忽视应用新方法的适用条件、范围以及文艺学美学本身的特殊性而造成某些“水土不服”、“生搬硬套”等问题；而部分学者则持基本否定和批判的态度，早在1980年代后期就有不少文章给这场讨论贴上了“新名词、新术语狂轰滥炸”、“换汤不换药”、“牛头不对马嘴”，甚至“全盘西化”等负面标签。我们不同意后面这种评价。我们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应当从文化记忆层面切入，尽可能回到当时的整体历史语境和文化学术语境，并由此出发，来历史地、客观地、公正地、科学地审视和评价这场“方法论热”，这里有几点须要辨明：（1）此“方法论热”绝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只是少数人头脑发热、人为炒作的结果，而是如前所说，既有大气候、大环境推动的客观必然性，也有文艺学美学界求创新突破的内在需求。新时期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改革开放”，文化、艺术、学术之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逐渐解放和变革，是其发生、传播和扩展的根本基础。（2）“方法论热”确如一些批评者所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无须否认的。但是，更应该看到，它出现于“文革”结束不久、文化艺术“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以及文艺学美学刚刚开始恢复—重建之时，出现某些不足和缺陷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不可避免的，只是那个时代丰富、复杂变革热潮中的小支流，是探索和发展中无法避免的局部问题。（3）有批评者指责“方法论热”存在盲目引进，甚至“全盘西化”等弊病。此言不虚，但亦绝非主流。虽然当时处在新时期文艺学美学发展的初探阶段，外国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优秀成果大量译介、引进、借鉴居显要位置，但应当看到，选择、批判、消化和吸收等工作也同时在扎扎实实地进行着，不但引进、译介是有选择的，而且借鉴、应用更是有选择、有批判的。据当时处在新方法引进洪流中的本人的回忆，在文艺、美学研究中尝试应用新方法（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的）的学者绝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立足于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新方法，力求为我所用，解决以往用老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拥有某种新方法或者“为新方法而新方法”，因而总体上不存在所谓“全盘西化”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努力将新方法中国化的过程。^②

同时，“方法论热”对一代学人的思想解放、学术精神的振奋具有巨大的冲击、激励作用，它所营造的自由争鸣的学术空气、开放宽松的精神氛围，探索、开拓的创新意识，对于学人思维方式的拓展、理论视野的开阔、研究格局的新变等，具有滋养、培育和熏陶的意义。本人作为亲历者和过来人，深感受益无穷。这种受益，不仅仅是个人研究方法或者观念上的启迪和更新，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学人、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精神境界和学术品格，促进他们通过方法变革的丰富多样的理论创造实

^① 李杨 《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② 上述一些观点，借鉴和参考了朱立元《怎样看待八十年代的“西学热”》（《文史哲》1996年第1期）中关于八十年代“西学热”的一些重要观点。

践,把获得的种种心得、体会、感悟积淀下来,逐渐摸索到适合每个人的做学问方式,在学术上较快地走向成熟。如果放在较长的历史时段中加以考察,可以发现,“方法论热”及其后几年观念变革创新的理论活动,实际上在塑造、培育一大批理论素养相对于前30年有所超越、有所前进的新一代学人方面有大功焉!仅从本文引述的大量论文来看,其中许多积极参与“方法论热”的学者后来确实成为文艺学美学领域知名的或者有影响的学术中坚,就是一个有力的旁证。诚如当代著名文学研究专家程光炜指出的,这场“文化热”(同时也是“方法论热”),“重构了我们这代学人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谱系”,“这种知识结构和知识谱系”“教育了几代人”,“这个起点和框架”“成为我们冷眼观察并深入了解名目繁多的聚变的历史瞭望塔”,“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安身立命的重要理由”。^①此话说得极其深刻!是的,只有从培育几代学人新的知识结构、知识谱系、理论视野、学术眼光等方面切入,才能比较贴近、比较贴切地揭示出1980年代“方法论热”在学术史、思想史上深远的突破性的意义。

我们认为,1980年代“方法论热”是一个大破大立、破中有立的动态过程。一方面,如前所说,它进一步打破了庸俗社会学(如“政治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等)、机械认识论、激进单一的政治、道德批评等理论批评范式大一统的学术格局,破除了“人性”、“人道主义”、“主体性”、“个体性”等诸多学术禁区,而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受苏联文艺学主流观念,尤其是所谓“苏联模式”即“日丹诺夫主义”的消极影响^②作了认真的反思,进而批判其极“左”的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范式和陈旧的学术话语(包括概念、术语、范畴等)。这个“破”为当时方法论的变革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学界将更主要的力量倾注在建设性的“立”上。大量借鉴、引入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新概念、新方法、新观念,尝试应用到文艺学美学研究中,成为一时之风气,参与者之众、思维之活跃、探索之深入、争论之激烈、规模之浩大,均堪称20世纪学术文化界之最,由此产生了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积极成果。它是新时期文艺学美学学科建设和创新的重要尝试和探索,极大地丰富了学科发展的方法路径,拓展了“文艺学研究的思维途径和思维空间”,“造成百年来文艺学学术史上研究方法的空前活跃和从未有过的丰富多彩”。^③对每个参与者、研究者而言,也大大扩展、增进了其思路、视野、思想,^④使其研究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的关注点逐步转向“主体性”等价值论层面,在理论观念上有了进一步的建树和创新,如“复杂人性”、“主体性”、“‘新美学—历史批评’观”^⑤等理论观念、研究范式逐渐酝酿、形成和确立起来。

应当指出,这场“方法论热”整个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指导下展开的,同时又反过来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体系。^⑥一方面它反思、批判了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僵化、机械、教条的理解,使真正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联系的、历史的、发展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得到澄明和昭示,恢复了活力和生机。另一方面积极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从现代西方文论、美学,如接受美学、结构主义美学、符号学美学等前沿理论中,借鉴、应用其中适合于文艺、美学研究的观念、方法,获得了更全面、完整、多维地认识和阐释文艺、审美现象的新工具、新视角、新路径,也就在不同程度上补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体系,促进了文艺观念及思想的“审美化”与“学科化”。^⑦

① 程光炜 《“85文化热”三十年》,《文艺争鸣》2015年第10期。

② 童庆炳 《苏联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③ 杜书瀛 《“方法论热”》,《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

④ 蔡毅 《关于“新方法热”的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⑤ 譬如陈默 《从“新方法热”到“新美学—历史批评”观》,《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6期。

⑥ 季水河 《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方法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⑦ 童庆炳 《政治化—审美化—学科化》,载《“新中国文学理论五十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10月。该文概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文艺思想的变迁轨迹,即“政治化”→“审美化”→“学科化”。

尤其需要补充的是,若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加以考量,它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就参与者人数、规模而言,它远远超过“五四”时期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倡导“新文学”打倒“旧文学”的新思潮以及其他一系列思想、学术争鸣,其声势之浩大,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无出其右者。就讨论的问题而言,涉及学科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也是思想史上少有的,不仅文艺学美学,哲学和其他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不同程度上卷入了“方法论热”,均带来了学科观念的转型和更新,就连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之相比也稍逊色。特别是就其影响而言,由于它所选择的聚焦点是基础性的,集中于思维方式的变革上,故不但能变革方法论本身,而且能够介入和“撬动”文艺学美学观念乃至学科的整体变革,其影响能够进而波及、扩大到总合所有学科领域的思想界,引起思想领域的整体新变。所以,毋庸置疑,1980年代的“方法论热”确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下面,我们再对“方法论热”的两个问题做一点反思。首先,我们认为,最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的,是观念与方法的关系问题。当时,有一派观点(如徐贲、钱学森等)认为观念更为基础、根本,是观念决定方法,而不是相反。方法之引入、突破和更新的前提和基础是观念的潜变、解放和革新。“方法论热”的兴起,根本上是由文艺学美学观念的开放、潜变,突破了“认识论文艺学”、“革命论文艺学”、“政治学文艺学”^①等的束缚,激发、催生了情感论、实践论、感兴论、体验论等新观念,^②才引发起来的。这当然不错,但是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这一方面,我们前面已经论及。但是,还应当看到另一方面,即方法也可以反作用于观念,观念变革不仅离不开、同时也需要和依赖方法的多元化、多样化^③,在一定意义上,方法论也可以决定和推动观念的更新。实质上,方法论的变革乃是思维方式的更新和拓展。它的变革决不仅仅是方法本身的自我更新,而且实质上促进、带动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带来了研究视野、视角、聚焦点、侧重点等的变化和移动,揭示出以往研究中某些被忽视、遮蔽乃至遗忘的部分,进而带来相关观念的变更。诚如笛卡尔《谈谈方法》所示,新真理、新观念的发现和获得,绝对离不开并必定需要寻找新的方法。^④如中国古代文论研究1980年代取得了显著进展,其中关于形象、意象问题的历史梳理和理论探讨,在美学研究方法的介入下走在学界前列,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它“开形象思维之美学讨论的风气之先”,他甚至认为1980年代古代文论研究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要把一些文论问题提升至美学层面来认识和解决,并在美学史话语体系内部来统摄具体的文学理论范畴。^⑤

认真回忆起来,1980年代这场“方法论热”实质上就是方法与观念互动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三段:大观念冲击→方法论变革→文艺学美学具体观念更新。(1)在思想解放运动大潮引领下,大观念层面发生重大变革,在整个学术界、思想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被否定,畸形的“阶级”论、“工具”论、机械反映论等文艺学美学极“左”观念得到清理与矫正,更重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念、审美的文艺学美学观念从过去长期被歪曲、遮蔽中解放出来,得到了广泛传播。(2)大观念层面的解放,冲击了以往僵化、机械、狭隘的思维方式,直接带来了学术方法论层面的重大变革,“独断论”、“机械论”等逐渐被突破和超越,刘再复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一文中概括的七条新倾向,实际上就是当时方法论更新

① 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

② 李泽厚《形象思维续谈》(《学术研究》1978年第1期)、《形象思维再续谈》(《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以及朱光潜《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等,揭示出认识论观念遭到突破,情感论、实践论等观念得到凸显。

③ 参见朱立元《美学研究的方法应当多元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④ 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谈谈方法》里没有这句原话,但存在类似说法。据此,我们提炼、概括出了这一论断。

⑤ 王耘《八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的解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2日,第5版。

的若干重要表现。^① 需要指出的是，“方法论热”的出现，既是大观念解放潮流冲击下的必然产物，又是学界努力走向文艺学美学具体观念创新建构的必然选择。虽然这种选择看似不十分自觉，但在当时多数学者看来，要寻求文艺学美学观念上的突破和创新，唯有在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下工夫，所以大家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于方法论更新上。而一些学者初步尝试的成果，更加坚定了人们的这一选择，因此才会有后来者此起彼伏的追随、跟进和呼应。一时间谈论方法论更新成为学界的时髦话题，学者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加之当时文艺报刊等的积极响应和推波助澜，终于促成了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变革的热潮。但如前所言，与方法论层面相比，大观念层面的变革更为基础和根本，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的历史趋向。⁽³⁾ 但同时，此“方法论热”也反过来带动和助推了文艺学美学具体观念层面的革新和发展，而且其本身就意味着并敞开为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和新的文艺学美学观念，前述刘再复“文学主体性”论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方法论更新的代表性成果。总起来看，方法论构成了从大观念推进到具体观念之间的中介环节，观念（含大观念和具体观念）和方法二者双向互动、互相促进、共同构成和呈现出这一变革的基本样貌。

其次，自然科学方法能否引入和如何引入问题，也是值得反思、至今没有过时的。在这场“方法论热”中，大部分参与者对文艺学美学引入和借鉴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对引进自然科学方法论，部分学者则存在疑虑，有的学者鉴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在学科性质上迥异，甚至持根本反对的态度（如刘小枫、杨炳等）。这种观点当然不无道理，特别是生吞活剥、机械照搬地硬套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必定走入死胡同。实际上，在西方美学史上也不乏此类现象，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在名著《美学的历史》中就批评了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对“自然科学的方法”的“迷信”。^② 但是，一概抹杀、完全否定对自然科学方法借鉴、吸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比较狭隘、比较片面了，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因为，在自然科学方法与文艺学美学方法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似、相通、相契合之处；以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为本，对某些自然科学方法作合理、恰当的借鉴、改造和吸收，不但可以充实和丰富其自身既有的方法论系统，也能够唤起和带动文艺学美学观念的解放和更新。事实上，当时涌现出的《系统美学》、《当代科学与美的变革》等一系列重要著述，就是在吸收自然科学方法论基础上取得的。无独有偶，国外也可以找到相似的例证。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克拉斯·鲁曼（Niklas Luhann）借鉴、吸收系统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在1984年出版了《社会系统论》，并以此为理论框架，出版了《社会中的宗教》、《社会中的艺术》等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这说明，只要运用得当，注意找准文艺学美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点，合理、恰当地改造和吸纳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关于人文学科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本人当时就提出通过哲学方法的中介加以转化和应用的观点^③，现在看来，仍然不失为可以考虑的思路。

当然，我们尝试重建1980年代“方法论热”的文化记忆，不是留恋和怀旧，也不是想无限拔高它。在文艺学美学研究乃至一切人文学科研究中，方法论变革本身决不是目的，它归根结底还是为观念变革、理论更新服务的。“方法论万能”甚至“方法论崇拜”是荒谬的，要不得的。总之，1980年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虽然已成为“过去时”，但是它对21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建设的影响和启示还没有过时，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记取。

责任编辑：王艳丽

① 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读书》1985年第2期。

② 克罗齐《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48-249页。

③ 参见朱立元《对文艺学方法论更新的若干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